



Title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
Author(s)	许，卫东
Citation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2022, 2022-1, p. 1-24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87556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22-1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
—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

许 卫东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略述遗补
— 天羽英二日记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历史探析 —*

2022 年 3 月 31 日

许 卫东[†]

* 本稿は公益財団法人 JFE21 世紀財団 2021 年度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中国華南における日本占領期国策開拓事業の歴史的役割について」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 大阪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経営学系専攻経営情報講座准教授（xuwd@econ.osaka-u.ac.jp）

笔者于 1980 年 9 月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本科，81 年 3 月被选派往日本留学，转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虽然在中山大学的学习期间只是短暂的半年，但它在笔者心目中占据的母校地位丝毫未变。适逢 2024 年中山大学迎来建校百年之喜，仅以此文表示祝贺。

一、孙中山先生与国立广东大学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¹。尤其是1921年4月2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军事和政府的人才培养成为政府开创局面的首要工作。作为孙中山先生心心念念的重中之重，与黄埔军校同步启航的国立广东大学于24年创建时便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推动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号召国人和华侨解囊相助之外，亦努力开展多边外交，争取国外的支持，其中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落实，由此获得的专项资助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简陋的办学条件。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源于“对华文化事业”，总称“东方文化事业”。

“东方文化事业”主要指日本国会于1923年3月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与换文，组建由中日双方委员参加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中国负责筹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并资助中日文化交流和留日学生等事业²。

由于广州地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为国立广东大学争取“东方文化事业”款项资助的提议难以直接通过与其对立的北洋政府作为中方代表参与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推荐，须另辟途径，通过建立与日本政府直接沟通的渠道来进行。由于这段历史比较特殊，迄今为止，甚少见到中山大学校史或学界提及“东方文化事业”的庚款退款对国立广东大学资助的过程以及资助项目的内容，留下史料依据的空白和缺憾。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徐志民（2017）所言，日本退还庚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既是顺应国际上退还庚款的趋势与潮流，也有以此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促进“日中亲善”感情的内在需求。经过历史层面的纷纷扰扰，中日关系最终从合作走向博弈和对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民国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解读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³。

创办大学需要校舍，也需要高质量和储备丰富的图书馆以及高规格的教学器材。作为新政府推出的“文有广东，武有黄埔”的人才培养计划的高标之一，国立广东大学虽是众望所归，但受财源所限，其举步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广州“各军云集、杂居市尘，教练管理，诸多困难，亟应移驻郊外，

¹ 自1895年1月策划反清起义事败后，首次避难逃亡日本，到最后一次于1924年11月赴北京和谈途中经停日本神户并做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讲。在近30年的岁月里多次造访日本。根据日本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考据，孙中山先生共14次访日，前后共计在日本居留长达10年。参照李廷江（2004）：『近衛篤磨と清末要人』原書房、p.540。

² 二战后GHQ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东方文化事业”机构被废止。但其下属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和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分别于1948年和49年并入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³ 日本方面由已故原东京女子大学的山根幸夫（1996）综述了有关东方文化事业研究的成果后，又陆续有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阿部洋（2004）、驹泽大学的熊本史雄（2013）、在国会担任议员秘书的藤田久贺（2017）等分别从教育制度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东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王树槐（1974）和黄福庆（1983）对庚子赔款退款的介绍，以及中国大陆的梁波（2002）、孙建春（2003）、孙颖（2007）、徐志民（2012）等的个案论证，这些研究总体上认为该事业是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与日本学界相对积极之评价有所区别。

以资整理，而立国至计，端肇树人，建设伊始，需才尤众，设立大学、需款正殷”的现实⁴，不遗余力地动员国内外的力量筹集经费，保证了国立广东大学建校计划如期落实。在这个过程中，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南方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政府究竟提供了何种资助？反映出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这些问题有待厘清。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教授在《邹鲁与中山大学》（1988）的综述中曾提及首任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先生为拓展财源而专门设置“争赔款临时委员会”⁵开展工作，同时“请日本总领事函致该国文化事业局转请各帝国大学赠送有关理农医三科纪要及杂志”⁶，另外在其旧作《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1977）一文中简单提到日本“1925年赠送国立广东大学理化仪器和图书”⁷。以上托请事由最终是否得到落实？规模有多大？后续的发展又如何？遗憾的是，黄在文中均无交代。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学中曾经大规模接受过日本庚款退款资助的除了国立广东大学外，还有私立南开大学。对于这段尘封的史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2020）亡羊补牢，通过专项研究计划完成了初步性的资料汇总⁸。

中山大学将于2024年迎来创校百年的光辉时刻。本文针对其前身的国立广东大学在创校期由广州南方政府争取日本政府庚款退款的外交成果，尤其是1.经费及教学资源的资助；2.对广东大学教师和学生赴日本考察的资助；3.赴日留学生的资助和广东日语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等，通过解读时任日本驻广东领事馆总领事天羽英二⁹的日记并将其记载的涉及国立广东大学建校的相关内容与其日本外务省档案进行核对，勾勒出当时中日关系背景下国际办学的历史脉络，以弥补校史遗漏的部分史实。

二. 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之缺与争取日本庚子赔款的策略

国立广东大学是奉1924年2月4日大元帅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年创立）、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创立）和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09年创立）三校合并而成，筹

⁴ 孙中山研究院（2019）：《孙中山对国立中山大学的拨款》（孙中山研究院网页 2019年10月29日公开，<http://www.suninst.com.cn/zxdt/content/367/34571.html>）。

⁵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79页。争赔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有周佛海、程天固、陈长荣、梁明致、梁龙、卢兴原、陈耀祖等。

⁶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84页。

⁷ 黄福庆（1977）：《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日本在华文教活动研究之二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216页。

⁸ 刘岳兵编（2020）：《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江苏人民出版社，664页。

⁹ 天羽英二（1887-1968）是日本德岛县人，1912年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毕业后，经外交官考试合格，入职外务省。其后派赴中国历任驻安东、广州（1923-25）、哈尔滨等地领事和总领事。1927年调任驻北平日本使馆首席参赞，1929年转任驻苏使馆参事，后调回日本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934年4月17日，根据外相广田弘毅指示，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资格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非正式讲话，声称欧美各国对中国的共同援助毫不顾及日本在东方的立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许外国干涉。这个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企图独占中国的所谓“天羽声明”遭到各国反对，后为外务省否认。1937年起任驻瑞士公使兼国际联盟日本事务局长，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接替白鸟敏夫出任驻意大利大使。1941年出任第三次近卫文磨内阁外务次官，试图打开日美谈判的僵局未成。后任东条英机内阁情报局总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甲级战犯被捕，1948年被解除战犯指控并释放，1968年死亡。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存有天羽英二文档资料库，包括5卷共6册内容翔实的日记。

备主任为邹鲁，而后依同年6月9日的大元帅令任命其为首任大学校长。客观而言，国立广东大学或中山大学的校史应以三校的历史为准。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之初，除上述三校的在校生转为本科生外，同年夏季另行招收预科学生，其中文科预科生120名，理工农三科预科生各100名，法科预科生100名，共计520名。这些学生除在广东本省招生外，同时委托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筹备处、上海大同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济南大学、山西大学、云南东陆大学等校代理招生事宜。当时的招生状况如下（表1）。

表1 国立广东大学首届本科预科生招生情况（1924）

生源籍贯分类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广东	931	265	28.5%
广西	136	38	27.9%
四川	61	18	29.5%
湖南	50	25	50.0%
江苏	19	5	26.3%
江西	18	3	16.7%
陕西	13	6	46.2%
安徽	9	4	44.4%
浙江	8	3	37.5%
福建	6	1	16.7%
云南	3	0	0.0%
贵州	2	1	50.0%
湖南	1	1	100.0%
山西	1	0	0.0%
（朝鲜）	2	2	100.0%
总计	1,260	372	29.5%

资料来源：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78页。

然而，在国家尚未统一、财政捉襟见肘的艰难时局，开办一所大学面临筹措经费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筹备处当时拟定国立广东大学的开办费预算为60万元，每年经常费约80万元。经费除原三校经费来源的九龙、拱北两海关厘金和省河筵席捐两项收入外，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别提拨几项款充当国立广东大学经费。计有：“（一）恢复契税减收原额二元。（二）广东全省各属筵席捐三分之二。（三）田二七业佃保证费。（四）香山、顺德两县民产保证费。（五）广东士敏土厂余利及江北多处石矿收入。（六）花县、英德两县出口灰石特别照费。”同时，成立财政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问题¹⁰。

1924年6月初，由于“开办费所差尚远，统计非有四十万元，不足以敷开办之用”，邹

¹⁰ 该委员会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叶恭绰、建设部长林森、广东省长廖仲恺、广东政务厅长陈树人、财政厅长沙洪年、盐运司长邓泽如、广州市政厅长孙科、市财政局长陈其援、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等为委员组成，会同邹鲁筹措国立广东大学开办费和经常费的款项。

鲁呈请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分令各县筹解款项，并开列各县应缴款数目。孙中山于 6 月 7 日给广东省长杨庶堪的训令指示：“令该省长即便遵照通令各县按所派数目，依限筹足解缴，以资开办”¹¹（表 2）。

表 2 筹办国立广东大学由广东省各县认捐解款数额

县 名	认捐数额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潮安、潮阳、揭阳（9 县）	20,000 元
台山（1 县）	15,000 元
三水、清远、高要、鹤山、开平、新兴、南雄、曲江、英德、澄海、普宁、梅县、海丰、陆丰、琼山（17 县）	5,000 元
增城（1 县）	4,000 元
乐昌、饶平、五华、博罗、紫金、茂名、电白、化县、阳江、阳春、澄迈、定安、花县、宝安、四会、恩平、高明、德庆、广宁、罗定、云浮、郁南（22 县）	3,000 元
合浦、灵山（2 县）	2,000 元
龙门、从化、始兴、仁化、翁源、连县、大埔、惠来、丰顺、和平、龙川、河源、信宜、吴川、廉江、海康、遂溪、徐闻、钦县、乐会、琼东、临高、儋县、崖县、万宁、文昌（26 县）	1,000 元
赤溪、佛冈、乳源、阳山、封川、开建、连平、平远、蕉岭、新丰、防城（11 县）	500 元
感恩、陆水、昌江、连山、南澳（5 县）	300 元
94 县合计	587,000 元

资料来源：〈各县应解大学筹备处数目〉《陆海空大本营大元帅公报》第 16 号，1924 年 6 月 10 日登载

适逢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专项用于清华大学的开办经费，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日本政府决定仿效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以在促进其所称中日亲善之目的。1918 年 9 月 21 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通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将于适当时候，放弃对庚子赔款的请求权。23 年 3 月 20 日和 25 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对支特别会计法案”¹²。闻之此讯的孙中山广州南方政府则不失时机地向日方提出以此退款扩充国立广东大学经费，并设立医院、研究所和图书馆等。

作为孙中山以及广州南方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沟通者，驻广东总领事的天羽英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羽英二于 1923 年 5 月接替前任的藤田荣介，25 年 2 月被召回日本。其在任期间适逢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期，经办了几乎所有涉及日本庚款退款的重要交涉事项。

出于其政治立场，天羽英二在广东总领事任上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疏通日本与广州南方政

¹¹ 与此同时，国立广东大学经费运动委员会发起募捐，制订《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由邹鲁呈请孙中山批准发布训令执行。遂组织学生上街沿门劝捐，从 7 月 3 日至 10 日，向广州市区住户、商号共捐得款 2,329 元，机关各职员 1,000 余元。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长廖仲恺各带头捐 20,000 元，一些军政要员、政府部门和绅商也捐了款。

¹² 其法案的主要内容是：（1）从庚子赔款余额 7,210.8776 万日元中，提取 1,570 万日元作为胶济铁路补偿金；（2）提取 232.1635 万日元的生利所得，赞助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每年以 250 万日元为限，余款作为公积金存；（3）日本政府应每年制定预算，列入政府总预算中，交国会批准。

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以此维护日本在华南地区的既得权益。

经过整理天羽英二的日记（图 1），可以看出其在广东任内期间多次面见孙中山并受托提出新政府向日本贷款的各项方案，也包括积极利用日本的庚款退款推动国立广东大学办校计划的具体事项（表 3）。



图 1 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大阪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

通过对照天羽英二的日记记载内容以及日本外务省的公函往来的存档资料，可以发现天羽英二在广东总领事任内的工作重点和性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摸清广州南方政府的实力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日本的既得权益；
2. 注意收集北伐相关的战事发展态势的情报以及广东省内的派系对抗的趋势；
3. 广东社会抵制日货的情况，尤其是学生运动的特点，并与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强各国驻广东领事之间就维护关税特权的事宜密切联系；
4. 注重与台湾总督府以及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等日本官办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提升日本对南方势力圈的情报共享的价值和作用，为此曾两次专赴台湾游说；
5. 积极推动“东方文化事业”对接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计划；
6. 加强与广州南方政府（包括广东军阀）中有留日背景人士的感情沟通；

天羽英二于 1923 年 5 月 13 日抵达广州到任，3 天后的 5 月 16 日由廖仲恺全程陪同前往大本营拜见孙中山。见面即迫不及待地表明日本外交奉行独立自主性，不在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之间选边站，不当靠山。其实这是日本的狡诈之处，担心在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对各方势力的现实情况估摸不清而压错了宝，无意间损害了日本的既得权益¹³。

¹³ 从天羽英二多次的演讲内容来看，他对有留学日本背景的人士居多的广州南方政府颇具好感，但同时也与北京政府方面保留密切的接触。1924 年 6 月 13 日，曹锟任内的北京政府授予人在广州的天羽英二三等宝光嘉禾奖章，在天羽通报日本外务省后亦得到可正式佩带的许可。

表3 天羽英二就任日本驻广东省总领事期间面见孙中山及财经方面的交涉事宜

日期	事由	当事人	备注
1923.5.4	日本外务省接受训导	日本外务省次官和局长	
5.7	从长崎出港		
5.9	抵达上海		
5.12	抵达香港		
5.13	乘河南号邮轮抵达广州	日本士官学校，海军学校毕业生迎接	
5.16	拜见孙中山并谈日本外交	廖仲恺全程作陪	广州大本营
5.21	梁士诒来访	借款（未标项目）	领事馆
5.22	廖仲恺来访	洽谈由台湾银行贷款 20 万元，省公署做保以盐税作为支付	领事馆
5.24	何品佳来访	续商台湾银行贷款 20 万元事宜	领事馆
6.9	廖仲恺来访	马伯年商借 45 万日元之事宜	领事馆
7.2	廖朗如来访	商借 2 万日元	
8.3	南海县李县长来访	洽谈华南银行借款之事宜	领事馆
8.4	何品佳来访	续谈华南银行借款之事	领事馆
8.28	何品佳来访	续谈从华南银行借款之事，以人力车税做担保	领事馆
8.29	吴尚鹰代表孙科来访	华南银行商借 10 万元，以人力车税做担保	领事馆
9.11	广州方面义捐 6680 元	作为东京大地震捐款汇往东京	领事馆
9.16	拜见孙中山		广州大本营
11.6	拜见孙中山	日方有高桥雄三郎驱逐舰队司令作陪，中方有廖仲恺，伍朝枢，吴铁城，孙科	广州大本营
●1924.3.4	李敦化，陈延炯，周斯铭	商谈对接日本对华文化事业	领事馆
3.18	拜见孙中山	长峰海关篠原关长，廖仲恺陪同	广州大本营
●3.31	广东高师学生 12 名来访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对接计划	领事馆
●4.5	陈延炯来访	广东学生访日安排事宜	领事馆
●5.8	邹鲁，许崇清，何春帆，金湘帆，陈延炯，周斯铭，李敦化等	广东高师访师生赴日考察团的人数和安排等事宜	领事馆
●8.1	汪兆铭，邹鲁	学生赴日访问及庚子赔款的对接	广东高师
8.16	拜见孙中山	会同英法总领事咨询陈廉仲商团事	广州大本营
9.10	何品佳	借款	领事馆
●10.3	柳金田来访	督促日本对广东大学的经费和器材补助	领事馆
●10.11	王仁康，柳金田，溥家宫，郑彦芳等	赴日考察团和教育视察团的归国茶话会	领事馆
●11.11	早上 10 点，清水副领事	参加广东大学创办典礼	广东大学
11.13		孙中山乘永丰舰启航，14 日离开香港	
●12.1	邹鲁，许崇清等 20 人	招待对华文化事业的相关人士	领事馆
1925.2.20	胡汉民，伍朝枢，溥秉常，吴铁成等送行	离任，抵香港，24 日抵上海，28 日抵神户	

资料来源：天羽英二刊行会（1984）：『天羽英二 日記・資料集 第1巻』（日文版）

由于广州南方政权新建，百废待举，财政支出上抓襟见肘，为此孙中山指令廖仲恺等政府要员多次面请天羽英二向日本政府转达提出借款的事宜，并承诺以除关税之外的税项作为担保。或许是为了避嫌，天羽并没有全数通报日本外务省，而是通过介绍有台湾总督府背景的台湾银行和华南银行接洽的方式，以商业贷款的形式做了技术性的处理。

天羽日记并没有具体提到针对国立广东大学的借款计划，估计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面临

百业待兴的困境和战事急需，贷款计划已无法划分专款专用。

有关创立国立广东大学的话题，首见天羽日记于 1924 年 3 月 4 日记录的李敦化（1920 年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时任广东大学筹备处委员兼理科教授）、陈延炯（京汉铁路局局长）、周斯铭（广东中央银行副行长）为对接“对华文化事业”（“对支特别会计法案”）事宜的来访。其后又经过安排广东高师的赴日考察团的行程，继而延展到其后的日本捐助国立广东大学图书和教学器材的外交周旋，转入密集的联系。

三、对华文化事业对接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内容

由于天羽英二对日本外务省的力荐，广州南方政府获取庚款退款对国立广东大学的资助计划开展顺利，颇具成果。

根据史料的记载，庚款退款用于资助的内容主要有图书资料类和教学器材类等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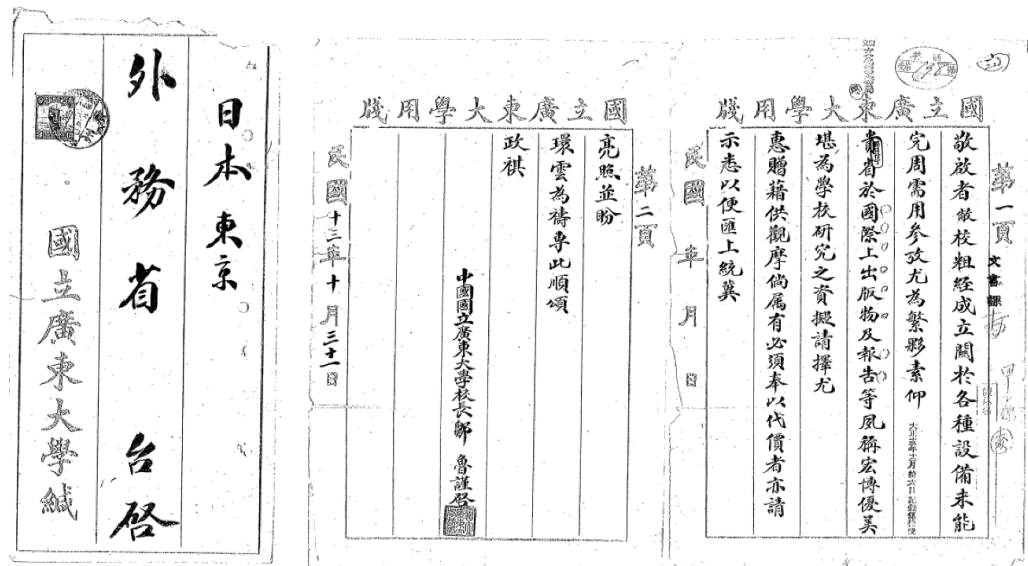


图 2 邹鲁通过天羽英二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图书捐赠的公函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530500 在広東天羽総領事（広東大学ヨリ請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提出捐赠图书资料类的呼吁首先见于邹鲁校长 1924 年 10 月 31 日发往日本外务省的公函（图 2），其中重点强调了希望得到国际出版物及报告书的捐赠。同年 11 月 11 日国立广东大学举办开学典礼后，又于 1925 年 1 月 13 日致函给天羽英二，提出急需理、医、农等基础学科的学术杂志和日本各帝国大学刊物用于教学和研究（图 3），应该是顾虑到了创办初期学科设置较精简的具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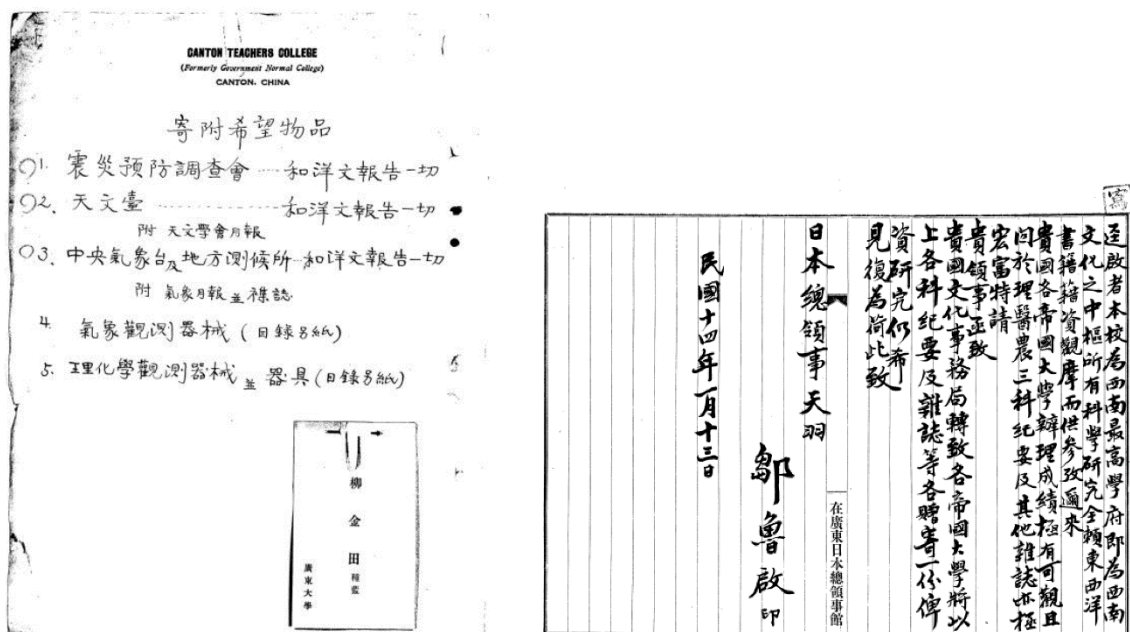


图3 左为物理系主任柳金田教授向日本提出的希望捐赠图书和教学器材的清单
(1924.8.25 送达日本外务省)

右为邹鲁校长向日本提出希望日本的帝国大学捐赠理农医三科的纪要及学术杂志的函件(1925年1月14日送达日本外务省)

资料来源: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6025100 7. 広東大学二図書

寄贈二関スル件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捐赠国立广东大学的倡议的回应很积极,落实的步骤也很快。

首先,日本外务省1924年11月13日便以文书课长的名义给天羽英二驻广东总领事发函,告之将先捐赠外务省图书资料室编辑的1918年版条约词汇(日文版和英文版)、外务省公表集第1~4集、1924年移民法制定过程及外交交涉实录等共28册¹⁴。

其次,1924年12月10日庚款退款的主管部门对华文化事业局以出渊胜次局长的名义协调日本震灾预防调查协会捐赠出学会的出版物,包括震灾预防调查协会报告书(日文版)83册、英文版翻译件22册、纪要37册、观测实录5册等共计147册。因为当时日本刚刚经历过23年9月1日的7.9级关东大地震,国际社会对地震预测的关注度上升,日方可能判断这些资料较适合邹鲁校长主张的理科实践教学¹⁵。

另外,各帝国大学理、医、农等基础学科的校刊捐赠工作则显得有些凌乱。1925年1月26日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冈部长景部长的名义向各大学的学部发函征求意见,有的大学积极

¹⁴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0530500、0/へ) 在広東天羽総領事 (広東大学ヨリ請求) (7-1-6-1_008)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¹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100、7. 広東大学二図書寄贈二関スル件 自大正十四年八月 (H-6-2-0-26_00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回应，如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将创刊号以后的 7 部校刊捐出，而京都大学农学部则表示没有多余故无法捐赠等等¹⁶（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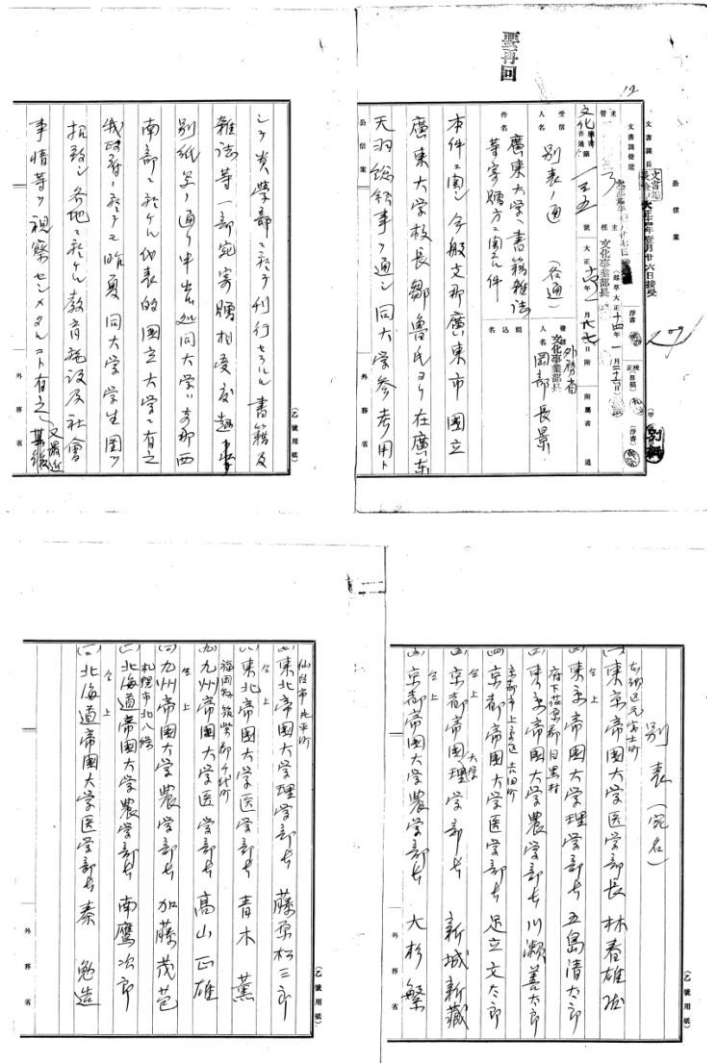


图 4 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各帝国大学发函提请协助捐赠校刊和纪要的档案资料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100、7. 広東大学二図書寄贈二関スル件 自大正十四年八月 (H-6-2-0-26_00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根据文献记载，邹鲁校长为充实图书馆十分重视购置新书，1924 年初的大学筹备阶段就编列图书经费 1 万元，到年底图书馆藏书达 3 万 6 千册，西文杂志有 49 种，中文杂志有 50 多种¹⁷。日本捐赠图书的添加，令其增色不少。

另外，除国立广东大学外，对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现华南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的赠书倡议亦得到响应。

相比起图书捐赠的分批次交涉，捐赠教学器材的交涉和选定过程则比较顺当。

¹⁶ 注15的H-0795

¹⁷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上册，84 页。

邹鲁校长于 1924 年 12 月 14 日致函给日本外务省说明办学所需之紧迫，询问能否动用庚款退款采购教学器材，并附了一份清单，经天羽英二驻广东总领事转达（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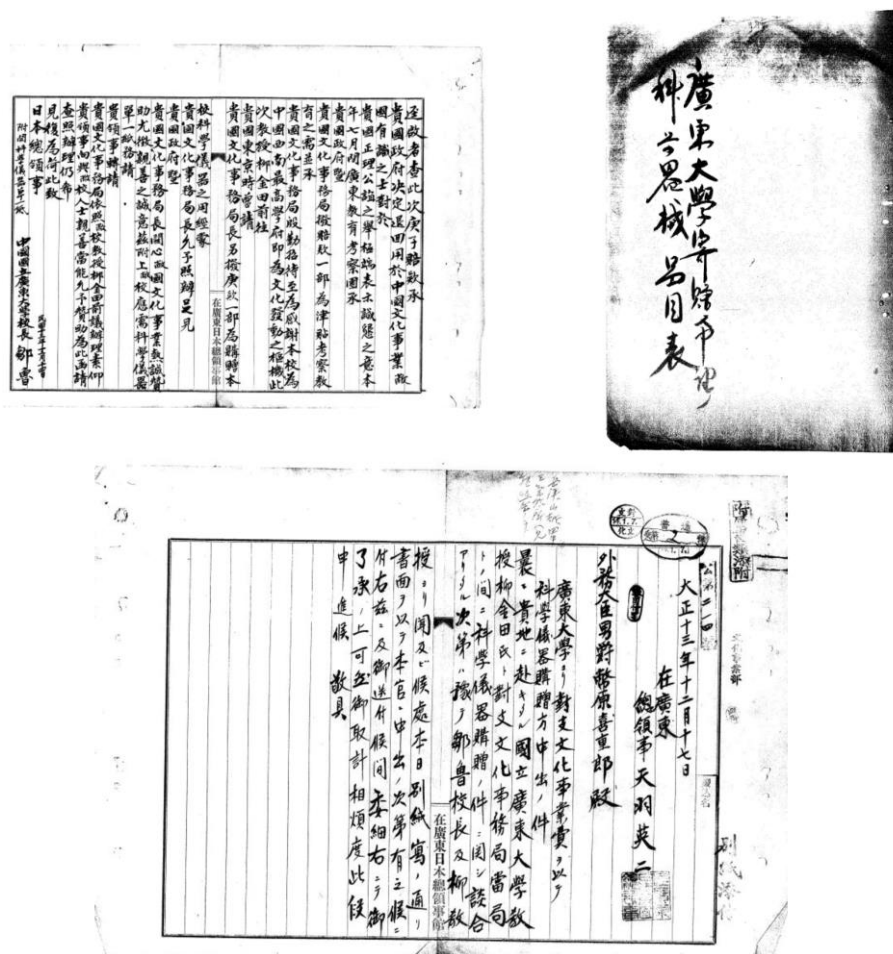


图 5 邹鲁校长提出用庚款退款采购教学器材的商请函以及天羽英二的推荐说明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400、8. 広東大学へ科学器械
寄贈関係自大正十三年十月 分割 1 (H-6-2-0-26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方收到求助函后马上研议，同意安排并指定由日本最顶尖的国立科研机构一理化学研究所负责把关，同时选定位于京都市的分析仪器老牌厂家的岛津制作所为总供货商。

国立广东大学提出的教具和器材清单共 289 件，包括生物标本、X 光机、电子显微镜、离心机、分光仪表、气压器、分光仪表、气压和温度记录器、小型发电机、化学实验桌等主要用于理化实验和医学病理分析的基础器材。

岛津制作所将订单的 289 件分拆成 3 部分，除岛津的自家产品外，将部分订单交付于东京的山越工作所，需要从欧美进口的部分则交给田中商事会社，分期分批汇总。

以上货物到期后全部交付给理化学研究所，由理化学研究所清点并打包后按外务省的指令通过货船送达广州。

根据档案资料，岛津制作所 1925 年 5 月份除一部分短缺品之外，备齐了大部分货源，并交付于理化学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添加了一部分自备品（价值 2,091 日元）后共装了 16 个

木箱，总价值为 19,988 日元¹⁸。这些货物以外务省的名义于 26 年 2 月 25 日从横滨港发货由日清汽船公司的庐山号货轮经上海港于 3 月 17 日运往广州（图 6）。

适逢邹鲁因参加西山会议背负分裂罪名被罢免国立广东大学校长职务，捐赠器材的接收人改为代理校长的褚民谊（图 7）

褚民谊于 1926 年 4 月 29 日和 5 月 8 日分别致函于接任天羽英二任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的森田宽藏表示收到 16 箱 54 种 102 件教学器材并致谢。不过第二封函特别强调因运输原因，共有 7 件物品已经破损的情况。对此，日本领事馆曾制表上报，但究竟有没有补货，则未见下文。

1926 年为纪念于上一年病故的孙中山先生，广州南方政府将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28 年北伐完成统一全国的政治使命，经广州迁到武汉后，再迁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转型成为中央政府。

其间，日本对更名后的国立中山大学继续赠书，一直未停。比较显著的有 3 次。

1927 年 8 月 2 日，日本外务省对外文化事业部发函经驻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转给朱家骅副校长，表示为配合中山大学扩充图书馆第一期计划，提供 3~4 千日元左右的图书。从清单来看，主要是各类事典、法规和法典、大学纪要、农科所（包括水产和林业）报告书、学科概论、日本各类统计等¹⁹。根据 28 年 2 月 15 日的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给外务省的第 66 号公函所述，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杨振声答复称上年的 10 月 17 日收到经香港转来 5 箱书籍，正在编写目录（图 8）。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赠书的公函来往中，27 年 8 月 9 日发往外务省的第 219 号公函中提到中山大学拟新建日本文化日语专业，究竟如何，也未见下文²⁰。

1929 年 3 月 4 日，由日本外务省会计课的申报表所示，依然由对华文化事业部继续发送中山大学庚款退款专项的捐赠图书。清单目录共 5 箱，1 号箱有 65 册，2 号箱有 46 册（内附日本参谋本部制作的日本彩色地图 103 张、中国大陆实测地图 1,358 张、朝鲜半岛实测地图 722 张），3 号箱有 53 册，4 号箱有 80 册，5 号箱有地图册共 4 册（图 9）。

¹⁸ 根据日本三菱 UFJ 银行的估算，按 1920 年代初期的物价水准当时的 1 日元相当于现在的 4,000 日元，故 19,988 日元的货值相当于现价约 8,000 万日元。参考网址（<https://magazine.tr.mufg.jp/90326>）

¹⁹ 从部分书籍清单来看，如作为民法中的私法，物权法和破产法等详解产权概念的文本在当时也是非常超前的。实际上，中国的物权法和破产法迟自 2007 年才开始实施。

²⁰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8200、8. 広東中山大学ニ図書寄贈 (H-6-2-0-26_00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品名		数量	單位	總額
一	レズ短持票	二	六	〇〇〇
二	有折用天秤	二	六	〇〇〇
三	五、精製天秤	二	九	〇〇〇
四	頭銜銃形散割針	二	九	〇〇〇
五	四轉針	二	五	〇〇〇
六	比律製散針	一	一	〇〇〇
七	最高美喉針	一	一	〇〇〇
八	最高美喉針	一	一	〇〇〇
九	磁石棒 二十種	一	四	〇〇〇
十	弓矢線球 五五五種	一	五	〇〇〇
十一	真空放電管 一具	一	五	〇〇〇
十二	單搖及短終飾	二	五	〇〇〇
十三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四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五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六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七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八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十九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二十	電力充電池	一	二	〇〇〇

財團法人理化學研究所

图6 理化学研究所最后核定的发往国立广东大学捐赠器材的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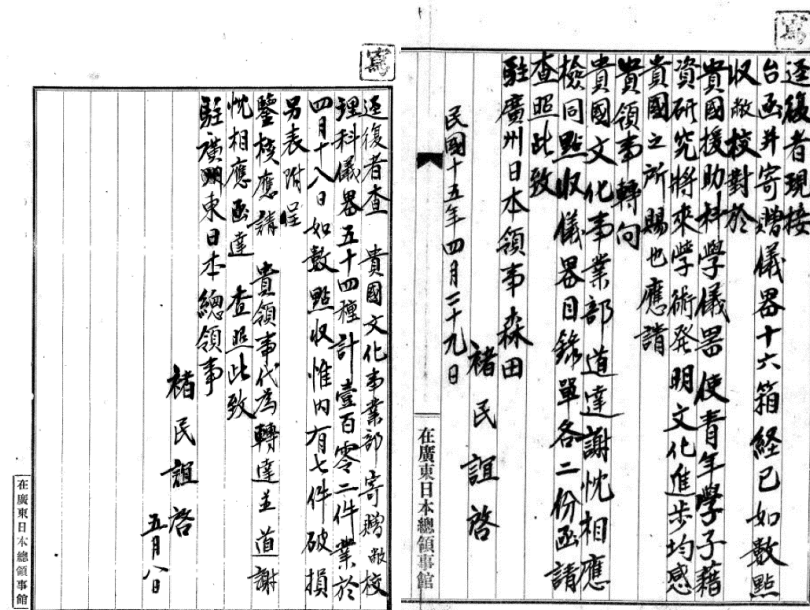


图7 褚民谊代理校长发函给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表示收到捐赠器材共16箱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5400、8. 広東大学へ科学器械
寄贈関係自大正十三年十月 分割1 (H-6-2-0-26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30年6月，由日本驻中国各地领事馆牵线，东京出版协会发起赠书活动，主要目的是配合当地留日校友会的需要。清单显示，同年12月16日由大阪商船公司海运送达广州，其中中山大学有3箱，岭南大学有2箱，广东省立图书馆有2箱，广州留东同学会有2箱²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国内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日文化交流陷入低谷，赠书项目也逐渐减少。

据史料记载，1934年3月28日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的名义委托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捐赠予仲恺农工学校（校长何品良）专业书籍192册²²。

1937年1月22日，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发送并经手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的中村丰一总领事交付私立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共4木箱609册图书，价值1,993.55日元。这是最后一次赠书记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的对峙状态，庚款退款的交涉事宜完全中断。至于汪兆铭政权在沦陷区另立的广东大学，则已是面目全非了。

²¹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85400、4. 東京出版協会ヨリ支那学校図書館等へ図書寄贈ニ関スル件 昭和五年六月 (H-6-2-0-26_01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²²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9400、2. 広東仲愷農工学校へ図書寄贈 昭和九年三月 (H-6-2-0-26_01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破産法説明 清水徹二	百五十円	廣松重吉
判例民法 第一卷 研究會 (改題)	五円	有斐閣
物權法 上巻 清水徹二	四円	有斐閣
物權法 下巻 清水徹二	四円	有斐閣
物權法 横田秀雄	四円	有斐閣
物權法大意 全上	四円	有斐閣
物權法要論 早川彌三郎	五円	明治堂
不動産登記 若林吉吉	百五十円	明治堂
法律學說判例集 高瀬喜一郎	五円	法律評論社
法律學說判例集 全上	六円	全上
法律學說判例集 全上	七円	全上
法律學說判例集 全上	七円	全上
民事訴訟法 松岡義正	六円	義隆堂
民事責任論 園野新之	七円	全上
民法教科書 善文書會	四円	清水書院
民法釋義 中島五吉	七円	全上
民法釋義 物權編 上巻 (巻三)	七円	全上
民法釋義 物權編 下巻 (巻三)	六円	全上
民法總論 (上巻) 植積重遠	四円	有斐閣
民法總論 (下巻) 植積重遠	四円	有斐閣
民法に關する問題 手野義太郎	四円	全上

图 8 1927 年由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捐赠中山大学图书的部分目录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28200、8. 広東中山大学ニ図書

寄贈 (H-6-2-0-26_00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p>昭和四年三月十四日起案 昭和四年三月十八日決裁</p> <p>第一課長 第二課長</p> <p>廣東中山大學ハ南支那有數ノ學府ニシテ從來本邦トノ關係淺カラサル處同校圖書館成立以來中外ノ書籍ヲ蒐集シ銳意其ノ完備ヲ圖リ居ルモ尙不備ノ點多クアルヲ以テ文化事業部ヨリ別記日本出版圖書寄贈アリ度キ趣ヲ以テ同大學校長殿傳賢、副校長朱家驊ヨリ同地矢野總領事ヲ經テ當方ヘ申出アリタリ</p> <p>右ハ對支文化事業トシテ有意義ナル事ト思惟セララルヲ以テ昭和三年度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事業費ノ補助金一千六百圓ノ範圍内ニ於テ書籍購入ノ上寄贈スルコト致度</p> <p>右仰高裁</p>		<p>會計課長</p> <p>外務省</p>
---	--	------------------------

图 9 1929 年日本外务省会计课申报捐赠中山大学的图书经费事项的报表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0900、2. 広東中山大学へ図書

寄贈關係 (H-6-2-0-26_00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四. 赴日考察团的活动以及研究资助

利用庚款退款的另一重要项目是资助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和学生赴日考察以及资助留学。依照庚款退款的安排以及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计划,日本接受中国大学的赴日考察团的计划从 1924 年开始实施,一般分大学分批专项对接。

听闻日本有此计划,适逢国立广东大学筹建,于是由邹鲁校长、许崇清教育厅厅长校务负责人通过时任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的天羽英二总领事的牵线,获得日本外务省同意,1924 年 6 月由柳金田物理系主任领队组成首次的国立广东大学赴日考察团。

1924 年的赴日考察计划由东京的日华学会²³担任接待工作的窗口,外务省协调联系参访单位。当年共邀请中方的教育机构 13 所,除国立广东大学外(共 27 人,表 4),还有北京教育考察团(15 人)、北京医科大学(2 人)、北京师范大学(6 人)、北京工科大学(6 人)、北京农业大学(4 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2 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 人)、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6 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 人)、武昌师范大学(2 人)、广州市教育考察团(14 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6 人)等²⁴。其中,广东的人数最多,考察范围最广。

此次赴日考察计划组团时,国立广东大学尚在筹备阶段,待成行后大学已经开始挂牌,故日本的外务省档案记录上也做了区分,名单上是旧三校,考察团名称则统一为广东大学。考察团的日程安排如表 5 所示,内容颇多,包括参观各种学校、气象台、科研所、法院、农科所、企业以及现场座谈会²⁵等,根据当时任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天羽英二总领事与外务省的书信交往,其实广东方面也提出多项考察军港和兵工厂的要求,最后未能如愿,仅止步于东京近郊的所泽战斗机基地,但也反映出当时国内北伐蓄势待发,各界对军事技术持有很高的兴趣。考察期间共 17 天,其中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与北京教育考察团(共 15 人,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北京政法大学殷公武教授带队)一起参加活动。

归国后,考察团于当年 12 月编写并出版了《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²⁶,这是国立广东大学建校后公布的首份教学业绩(图 10)。

此后,利用庚款退款实施的计划是 1934 年中山大学理工学院组织的赴日考察团,由罗雄才化学系教授(1929 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毕业)、康辛元化学系教授、董爽秋生物系教授、袁文魁化学系助教领队,共 18 名学生参加²⁷,在日停留十天。其间除考察大学、理化学研究所

²³ 1918 年成立于东京的日华学会源于早期实业家支持辛亥革命捐款设立的“中国留学生同情会”,而后成立第一家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代替日本政府专事留日学生工作。1921 年 6 月该会转为财团法人,受政府资助,以打破“留日反日”的局面为目标并培养亲日派与欧美国家争夺中国青年的教育权以及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等为目的进行过大量活动。第 1 任会长为小松原英太郎原文部大臣,后陆续由涩泽荣一和德川庆久接任,1924 年由细川护立(1993 年由非自民党的联合党派拥立任总理的细川护熙的祖父)接任。日本战败后日华学会被盟军司令部 GHQ 勒令解散。

²⁴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 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²⁵ 其中与日本女子大学的上代教授的座谈颇具教育理念的碰撞效应,传为早期妇女教育的启蒙经典。详见沈潔(2020):「中国語史料で語る日本女子大学の教育」『福祉教育』No.61, pp.33-42。

²⁶ 《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可从古籍网上分页查询(<https://bookinlife.net/book-242380.html>)或参考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 雑件(H-6-1-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也可于京都女子大学图书馆馆藏书中查阅。

²⁷ 理工学院的学生是古贲、徐骏平、黄星史、李叔涵、梁宣、赖祥华、曾汉志、黄朝班、龙耀嘉、梁泽生、白坚、曾梅英、梁兆禧、彭思严、黄宇常、刘君椿、梁宗善、杨家智等共 18 人。

和工厂外，还特意参访了横须贺的日本海军基地。

在此前的 1931 年，曾有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前身的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共 45 名于 6 月 10 日～7 月 11 日乘船到日本考察化学工业、基础建设和市政工程项目，也包括造船和飞机等军工产业²⁸。虽是自费，但各地的接待和安排由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门负责协调。

随着国立广东大学的本科教育走上正轨，利用庚款退款访日开展学者交流、学生留学以及邀请日本的学者来穗开设讲座等交流事项逐渐增多。

表4 1924年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师生名单及考察报告的执笔分工

姓 名	身份、专业	籍贯、备注	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执笔分工
柳 金田	广东高师领队教授	东京大学理学士	序（三）
谢 清	广东高师文史专业	湖南人	序（四）、旅程日志、访谈
李 励庄	广东高师文史专业	广东人（女）	日本高等教育概况及特点
李 钰	广东高师英语专业	广东人	
杨 时中	广东高师英语专业	广东人	
郑 彦荣	广东高师数理化专业	广东人	
刘 君黑	广东高师数理化专业	广西人	
丘 宝畴	广东高师博物专业	广东人	
刘 毓芬	广东高师博物专业	广西人（女）	
吕 兰芳	广东高师博物专业	广东人（女）	日本儿童教育概况
杜 鼎灏	广东高师专业不详	广东人	
郭 汉民	广东公立政法大学法律	广东人	
余 衍桓	广东公立政法大学政经	广东人	日本社会、东京市政、日光游览纪
邹 肇明	广东法科学院政经	广东人	
王 家齐	广东法科学院政经	广东人	
吴 震东	广东法科学院政经	广东人	
黄 干桥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广东人	日本农业概况、气象观测
梁 济亨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广东人	日本农业组织概要
郭 宗岳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广东人	
张 楷	广东光华医学专科学校	广东人	
李 俊英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广东人	日本的美术
傅 家官	广州市立甲种商业学校	广东人	日本商业发展探秘、商业考察观感
郑 衍藩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广东人	
刘 万新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广东人	
黄 玉麟	广东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广东人	日本警监大观（与陆 法铨合著）
陆 法铨	广东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广东人	
陈 慧生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广东人（女）	东京聋哑及盲人学校概况
杨 翠珍	随团翻译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300、7. 視察状況（H-6-1-0-4_00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 雑件（H-6-1-0-4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²⁸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05000、5. 昭和六年度分（75）広東工業専門学校卒業生（H-6-1-0-4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表 5 1924 年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的主要日程安排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6/6 (周五)	上野动物园、博物馆	三越和服店、滨里宫、芝公园
6/7 (周六)	东京帝国大学各学部	理化学研究所、营养研究所
6/8 (周日)	中央气象台	日本家庭、广东同乡会欢迎宴会
6/9 (周一)	东京高师及附中附小、巢鸭监狱，农庄	
6/10 (周二)	女子高师	聋哑学校、植物园
6/11 (周三)	最高法院、共立女子学校	女子体操学校、东京日日新闻社
6/12 (周四)	盲人学校	自由学园、丰岛师范
6/13 (周五)	成城学校	番町小学校
6/14 (周六)，15 (周日)	日光（中禅寺湖、华严瀑布、东照宫）	
6/17 (周二)	所泽陆军航空基地	日华学会细川护立会长欢迎宴会
6/18 (周三)	麻生兽医学校、上野美术学校	帝国图书馆、农科大学
6/19 (周四)	高等蚕丝学校、农科所	东京瓦斯公司总部及工厂
6/20 (周五)	自由活动	与北京大学赴日考察团联欢晚会
6/21 (周六)	转赴名古屋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 雑件 (H-6-1-0-4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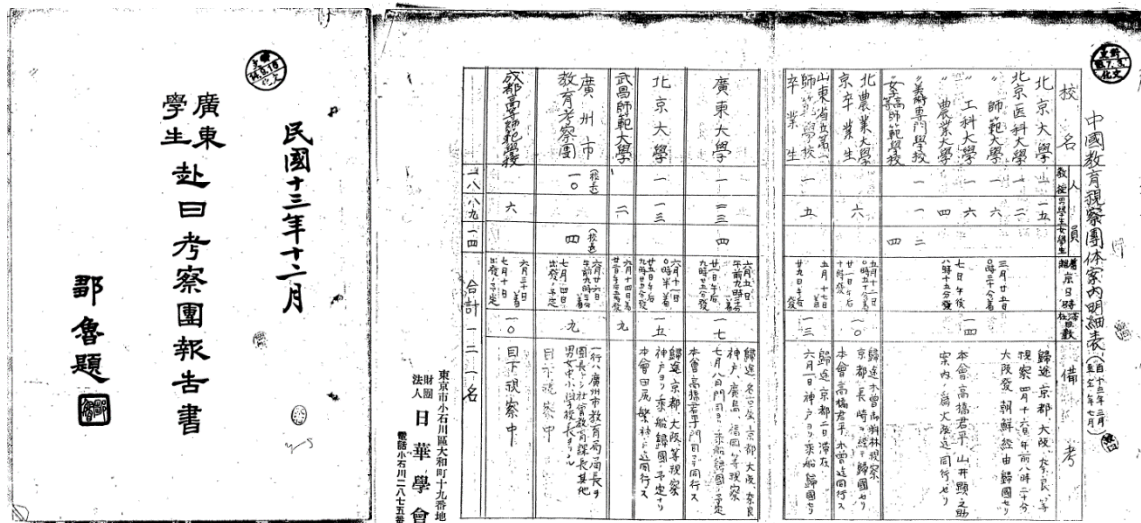


图 10 1924 年中方赴日考察团（右）以及国立广东大学学生编写的考察报告书（左）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29400、8. 雑件 (H-6-1-0-4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表 6 毕业于日本各大学医学院并在广东工作的医师名录（1935）

姓名	别称	籍贯	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
区伟基	佩韦	广东	千叶医科大学医科	广州上池药房
谭海夫	渔庵	广东	千叶医科大学药学科	广州新华药行
李灼槐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番禺县立医院院长
李博文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铁城医院院长
阮德和（女）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育慈医院
陈彦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十全医院
黄植	灼如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光华医学院
叶培初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东山浸会医院
雷周南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福宁医院院长
刘六峰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光华医学院眼科
黎启康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花柳医院
邝光衡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仁安药房
邝丽深		广东	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邝番石留医部
黄季直		广东	名古屋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广德医院
崔炽黄	育群	广东	大阪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永隆药铺
柳南柱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博爱会医院
崔元恺	仲稣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
庄兆祥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
杨子襄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教授
刘祖霞	啸秋	江西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
谭大同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广州大同医院
苏炳麟	师风	广东	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广东光华医学院
桂毓泰	紫东	陕西	京都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温泰华	崑如	广东	京都帝国大学医科	中山大学医学院
廖鼎铭	志人	广东	冈山医科大学医科	香港志人医院
张汝焯		广东	长崎医科大学医科	广州宏兴药房
陈豹	和荣	广东	长崎医科大学医科	香港幸福药房
黄道玲（女）		广东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广东博爱会医院
王基安		广东	日本医科大学医科	广东华侨医院
崔国滔		广东	东京药科专门学校	广东博爱会医院
李漾		广东	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	广州大圣药房

资料来源：同仁会（1935）：《中华民国医事综览（中国医师名录）》（东京出版）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网上可阅览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050143>）

根据外务省档案可查的记录，利用庚款退款项目赴日交流的学者有以下几个例子：

- 邀请中山大学范寿康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郑伯奇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冯其平教授（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即一桥大学毕业）会合中华学艺社一行于 1928 年 4 月 15 日～5 月 1 日访日考察，期间每人资助 500 日元；
- 1929 年 8 月资助岭南大学谢扶雅副教授（私立立教大学毕业）及夫人苏仪贞医师（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任职于广东博爱医院眼科）赴东京帝国大学进修 4 个月，共资助 1,000 日元；
- 1929 年 8 月资助中山大学何畏教授（别名何思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短期进修 2 个月，共资助 650 日元；
- 1929 年 9 月资助中山大学法学系薛祀光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赴日考察 2 周，资助 250 日元；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中日学术交流陷于停滞。

1934 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发布了理工学院扩建计划，按 6 年工期完成需 2,000 万元。虽获南京中央政府答应财政辅助 250 万元，但缺口仍然巨大。为此，邹鲁特别派遣何畏教授（别名何思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到日本寻求政府和民间的捐助²⁹。至于成果如何，至今未见记录。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曾应中山大学医学院刘祖霞院长的提议日方同意邀请医学院桂毓泰教授（京都帝国大学医科毕业）携助手 2 人赴京都帝国大学进修 1 年的计划，外务省拟每人每月补助 150 日元。但战事开启后，计划告吹³⁰。

至于日本学者来访广东则不多见，比较正式的记录仅有 1924 年 12 月 4 日~6 日，国立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邀请日本国学院大学校长及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的汉学家市村瓚次郎博士以“论环境与文化之关系并及儒教之体系”的题目介绍日本的儒学研究。

另外，广东籍贯的学生获得资助赴日留学者亦非少数³¹，其中以修医科为多，一来实用，二来当时日本的临床医学在亚洲高居首位，适合仿效。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大多回到广州或香港，一部分人成长为中山大学医学研究的顶梁柱（表 6）。当时广州有留日学生于 1914 年自发组织成立的“广州留东（洋）同学会”，时常举办联谊活动。根据档案资料，34 年曾经通过留东同学会捐赠给中山大学价值约 5 千日元左右的图书³²。

由于广东地处中国的南大门，又是孙中山先生推行革命的大本营所在地，肩负人才培养摇篮的大学教育迅猛发展，学习外语自然成为学生必备的基本功。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大变革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激发了学生对学习日语的兴趣，如表 7 所示，截至 1930 年代大多数的广东院校都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日语课，体现了广东文化善于海纳百川的精神特质。

²⁹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862800、25. 広東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舍建築全助成申請 昭和九年五月 (H-6-2-0-2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³⁰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15700、6. 昭和十二年度選定 (H-5-3-0-1_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³¹ 已故中山大学地理系的梁溥教授（1910-2006）是中国聚落地理学的创始人，梁溥先生于 1934 年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1936 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翌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运动，留学计划就此搁置。1985 年，笔者在日本筑波大学地理系本科留学，接待过参加中国地理学会访日交流团的梁溥教授，也曾经在东京拜访过梁溥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日本立正大学的大村肇教授，过往曲折令人感慨。1988 年，笔者考取东京大学地理系博士生，但在地理系资料室未查到梁溥先生的学籍记录。因为 1949 年日本的大学改制，帝国大学时期的档案已经归口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执掌，大学已经没有存档。梁溥教授生平可参考〈先生飘然仙去，身后桃李满园〉（广州日报 2006 年 3 月 15 日）

³²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856900、3. 広東中山大学及留東同学会ニ対シ補助承認 昭和十年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表7 广东省日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机构和教材（1930年前后）

教育机构名称	每周课时	需学年数	主讲人	教科书
国立中山大学 文科	3	选修1年	关德寅	关德寅专著《日语文法》和《日语读本》
国立中山大学 农科	3	必修2年	同上	
国立中山大学 法科	3	4年	彭玉书	不详
私立岭南大学	5	选修1年	谢扶雅	日语读本, 文典
国民大学	不详	不详	方继祥	和文读本入门
广东法官学校	3	不详	黄武	日语读本
广东法政学校	不详	必修3年	周宝璠	不详
广东工业专门学校	2	未定	刘伟确	教义
黄埔军官学校	5	2年	不详	日语读本、言文对照
广州警官学校	3	2年	不详	日语读本、日本文典
广东省立第一中学	3	选修	黄武	日语读本、言文对照
广东省立第二中学	3	选修1年	罗子璠	自编教材
女子师范学校	2	选修3年	张佩瑄	中等日语文法课本
女子第一中学	1 年级 5 2 年级 3 3 年级 3	选修3年	关德寅	不详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3	不详	丁衍庸	不详
保姆学校	2	3年	张乔五	日语读本
私立仲恺农工学校	1 年级 4 2 年级 6 3 年级 3	3年	原田武子 方继祥	和文读本入门 日语读本
大中学校	不详	必修3年	关德寅	日语读本、现代日语文抄
医药调剂学校	不详	3个月	崔国滔	不详
日文专修班 A	不详	不详	郑楚衍	不详
日语专修班 B	6	3个月	关德寅	日语读本、现代日语文抄
夜光日语讲习所	6	1年半	金夜光	读本、翻译小说、杂志
广州日文研究社 日语速成班	不详	暑假期间	谢求生 何健民	翻译、会话、作文

资料来源：根据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130929600、外務省情報局 1930 年作成、第十六、広東省（情-8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pp.89-91 整理

五. 结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当时中国有42所大学，为避免战乱，一些学校迁往西南大后方，如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往云南省昆明市，三校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则于35年的冀东事变时便未雨绸缪，将图书和贵重器材打包成550只大木箱，待时局明瞭后，全校迅速迁往重庆。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月的3个月和38年3、4、6月的3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³³。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占领广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

³³ 梁山·李坚·张克谟(1983):《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9页。

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³⁴。但即使是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下，教学并未止步，科研和医疗等对外服务也因地制宜，大放异彩，体现了中山大学秉持孙中山救国精神的使命和初衷³⁵。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中山大学财产损失数额居中国大学之首。据抗战后统计，除中山大学以外，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万册，战时损失近5万册。其中有多少是建校之后利用庚款退款累计十余年从日本获得的捐赠图书和教具，则不得而知，令人惋惜。

【参考文献】

中文

陈致荣（2012）：《中比庚款的退还与运用》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硕士论文，1-80页。

戴知贤·李良志（1995）：《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第150页。

段云章（1993）：〈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20-26页。

广州日报（2006）：〈先生飘然仙去，身后桃李满园〉《广州日报》2006年3月15日。

郭海清（2014）：〈浅析民国时期广州教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城市观察》2014年第3期，186-192页。

黄福庆（1977）：〈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日本在华文教活动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85-221页。

黄福庆（1988）：〈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71-114页。

黄福庆（1988）：《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86页。

黄义祥（1998）：〈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广州文史》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

³⁴ 戴知贤·李良志（1995）：《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第150页。

截至1939年2月底，中山大学各院系共到教职员245人，学生1736人。学校于3月1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英、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参考〈抗战时期广东文化业直接损失1,248万图书占八成〉《羊城晚报》2005年9月1日。

³⁵ 根据防卫省档案，对中山大学的关注并未终止。如1941年对中山大学组建桂林大学校友会联合办事处的内部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81000、各大学桂林校友会組織連合弁事処 国民日報 昭和16年3月1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42年6月24日金曾澄在韶关搬迁校舍当选中山大学校长的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65900、金曾澄、中山大学総長に 放送昭和17年6月2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以及开办韶关中山大学医院和4所研究所的通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50170700、中山大学に4研究所増設 華文放送 昭和17年10月1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2336000、中山大学に総合病院設立 華文放送 昭和18年1月26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李朝津（2011）：〈清末民初广东大学学制之发轫〉《东吴历史学报》第25期，141-185页。
- 李吉奎（2014）：〈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强国梦—孙中山的儒学观与传统道德继承论〉《人民论坛网》2014年1月12日（<http://www.rmlt.com.cn/2016/1112/445483.shtml>）。
- 梁山·李坚·张克谟（1983）：《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9页。
- 刘大军·许文果（2010）：〈论广东教育界对日本庚子赔款的争取〉《教育评论》2010年第6期，134-137页。
- 刘欢（2015）：〈抗战时期广东文化业直接损失1248万 图书占八成〉《羊城晚报》2015年9月1日。
- 姜子浩（2019）：〈1918-1923年间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形成，传播与落实—以留学政策为切入点〉《新北大史学》，第25期，5-34页。
- 桑兵（2001）：《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433页。
- 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2018）：〈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梦〉《团结报》2018年3月22日，007版。
- 孙中山研究院（2019）：〈孙中山对国立中山大学的拨款〉（孙中山研究院网页 2019年10月29日公开，<http://www.suninst.com.cn/zxdt/content/367/34571.html>）。
- 薛国瑞（1999）：〈民初中央财政危机下国立大学格局变动论析〉《现代教育论丛》第233期，35-42页。
- 王树槐（1974）：《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621页。
- 徐志民（2010）：〈1918-1926年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初探〉《史学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期。
- 徐志民（2017）：〈从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1931）〉《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4期，142-152页。
- 杨奎松（2012）：〈孙中山到底爱不爱国〉《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356页。
- 杨雯（2005）：《中英庚子赔款退款与甘肃文教事业发展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1-59页。
- 羊城晚报（2014）：〈民国广州大学“大学城”〉《羊城晚报》2014年4月26日。
- 易汉文（2005）：《孙中山与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出版社，98页。
- 尹虎（2017）：〈1919年前后期中日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日本问题研究》第190期，20-26页。
- 于文浩（2016）〈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博弈〉《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139-145页。
- 袁成毅（1999）：〈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41-55页。
- 袁伟时（2012）：〈百年风雨，逆风前行—中山大学80周岁感言〉《成为有智慧的教师》岳麓书社，481页。
- 张金超（2021）：〈《新国民日报》载孙中山史料的新发现〉《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122-129页。
- 周东怡（2011）：〈清末赴日视察风潮中知识分子的活动—以严修的教育活动及其贡献为探讨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46期，231-288页。
- 周谷平·张雁·孙秀玲·郭晨虹（2012）：《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转型、调试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376页。

日文

- 阿部洋（1977）：「『対支文化事業』の成立過程」『日本の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会紀要』，No.21，pp.38-53。
- 阿部洋（2004）：『『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汲古書院，p.1,065。
- 久保田祐次（2018）：「京都帝国大学と東方文化事業—教員の海外派遣を中心に—」『京都大学文書館研究紀

- 要』, No.12, pp.37-59。
- 熊本史雄 (2013) :『大戦間期の対中国文化外交』吉川弘文堂, p.362。
- 桑原太郎 (2021) :「第一次世界大戦前後における対中文化事業論の変遷—『外交時報』における言説の考察—」『ソシオイエンス』(早稲田大学先端社会科学研究所), Vol.27, pp.127-145。
- 経志江・船寄俊雄 (2004) :「中華民国における高等師範教育制度の成立とその性格」『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Vol.12, No.1, pp.1-12。
- 崔淑芬 (2020) :「中華民国初期における教育近代化の変遷」『筑紫女子学園大学研究紀要』, No.15, pp.41-53。
- 嵯峨隆 (2006) :「孫文のアジア主義と日本—「大アジア主義」講演との関連で—」『法学研究:法律・政治・社会』(慶應義塾大学), Vol.79, No.4, pp.27-59。
- 清水賢一郎 (2019) :「1924 年自由学園を訪れた中国視察団—外務省東方文化事業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生活大学研究』, Vol.4, pp.14-41。
- 沈潔 (2020) :「中国語史料で語る日本女子大学の教育」『福祉教育』No.61, pp.33-42。
- 徐蘇斌 (2005) :「戦前期日本に留学した中国人技術者に関する研究」井波律子・井上章一編『表現における越境と混淆』(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pp.281-310。
- 世良正浩 (2014) :「広東の教育に関する一考察—南方政府下の教育行政と広東大学の創立を中心として—」『明治学院大学教職課程論叢』, Vol.10, pp.1-40。
- 孫安石 (2003) :「戦前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日本語研究に関する資料の調査報告」『神奈川大学言語研究』No.25, pp.299-315。
- 張一聞 (2020) :「中華民国留日学生の経費不足と日常生活—1923～1937 年—」『アジア教育史研究』Vol.28・29, pp.61-83。
- 潘吉玲 (2020) :「「対支文化事業」をめぐる日中両国学者の連携—中華学芸社の動きを中心に—」『アジア教育』, No.14, pp.21-32。
- 潘吉玲 (2018) :「「特選留学生」学費補給制度 (1924～1940) に関する研究」『次世代論集』(早稲田大学), Vol.3, pp.31-54。
- 藤田賀久 (2011) :「近代日本の文化事業が目指していた理念—国益の追求か普遍的価値の追求か—」『多摩大学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学部紀要』, No.3, pp.27-38。
- 藤田賀久 (2017) :「1920 年代の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向き合う日本とアメリカ両国の対華文化事業の比較から—」『文教大学国際学部紀要』Vol.28, No.1, pp.111-127。
- 李嘉冬 (2010) :「新城新蔵と日本の東方文化事業—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長時代の活動を中心に—」『京都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 No.8, pp.21-34。
- 李廷江 (2004) :『近衛篤磨と清末要人』原書房、p.540。
- 山根幸夫・藤井省三・中村義・太田勝洪 (1996) :『近代日中関係史研究入門』研文出版, p.509。
- 山根幸夫 (2004) :『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汲古書院, p.240。

孫文による国立広東大学の創設と日中文化交流について
—天羽英二日記と「東方文化事業」の史料解析からみて—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wangtu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Japanese Cultural Project for China” in 1920-30s

許 衛東

近代中国の国父と呼ばれる孫文によって1924年に創設された国立広東大学（現在の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は、近代における中国統一の原動力であった北伐革命を支える人材養成の揺籃であり、華南の最高学府として知られる。24年11月11日の創立式典に開示された孫文の校訓親書、「博学、審問、慎思、明弁、篤行」をモットーに、同大学は近現代中国の思想・科学研究と教育・国際間の文化交流などのあらゆる分野において率先垂範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文豪として知られる魯迅が教鞭を取り、終生の伴侶となる許広平夫人と巡り逢えた場所もこの大学であった。

しかし、国立広東大学の創設当初、大きな財政難に陥り、そこで提案されたのは、北京議定書の賠償金返還をきっかけに日本が策定した「対支（華）文化事業」の活用であっ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東方文化事業」とも呼ばれ、1923年、義和団事件の賠償金を事業基金として用い、外務省管轄の文化事業として始まった。アメリカによる同類の寄付事業として有名なのは北京にある清華大学の創設である。その目的としては、当時の中国における反日感情の緩和を目指すためだった。25年からは「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という日中の共同事業に格上げされた。しかし、満州事変前夜の日中関係の悪化を受けて、28年に中国側が運営から脱退した。以降は日本単独の事業となり、42年の太平洋戦争のさなか、不要不急として事業は解体された。

本稿では、広東大学の創設前後における「東方文化事業」との関わりを1923～25年に駐広東日本領事館の総領事であった天羽英二の日記および同大学から提案された図書贈呈、教育機材の寄贈、教員・学生の訪日、留学生選抜、広東の日本語教育などの諸事案に対する外務省の応対を記録した公文書を紐解きながら、日中戦争の発端となった37年7月7日の「盧溝橋事変」に至るまでの日中文化交流の変転を追ってみた。

孫文と日本の関係は切っても切れない。偉人が創設した大学の足跡に日本の光と影が投射されていた事実は大きな歴史的意味を持つ。

担当委員（林 礼釗[†]）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 大阪大学大学院人間科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員、法学研究科招へい研究員